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学术丛书

北洋海军研究

戚俊杰 刘玉明 主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北 洋 海 军 研 究

戚俊杰 刘玉明 主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洋海军研究/戚俊杰,刘玉明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11

ISBN 7-80504-723-5

I.北… II.①戚… ②刘… III.北洋海军-研究-文集 IV.E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3083 号

北洋海军研究

戚俊杰 刘玉明 主编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山东费县方正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25 字数 450 千字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60

ISBN 7-80504-723-5
K·209 定价:27.60 元

学术顾问：

戚其章	王家俭 (台湾)	中塚明 (日本)
孙克复	关捷	王如绘

主 编：

戚俊杰 刘玉明

副 主 编：

刘新乔 王记华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书明	王天江	王记华	丛华滋	史丰永
孙园园	刘新芳	刘新乔	毕可江	张素梅
郭 阳	戚俊杰			

特约编委：

刘申宁 许 华 姜 鸣 苏爱荣

序

戚其章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海军的创建与发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与西方列强相比，中国海军起步甚晚，因为它不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而是学习西方的一项成果。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就是从创设近代造船工业开始的。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清政府经过20多年的努力，直到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才算建立起一支在当时说来比较象样的海军舰队。不料仅仅6年之后，这支舰队便在威海刘公岛前全军覆没了。古人有言：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今天研究这段历史，无疑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我国虽迟至19世纪60年代始筹建海军，但在当时却是一件新鲜事物，备受国人的关注，并且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甲午战后，人们反思中国海军失败之由，激起了研究北洋海军的兴趣。1896年，姚锡光撰成《东方兵事纪略》，其卷四为《海军篇》，述海军创建原委及甲午海战经过，条理清晰，要言不烦，是为国人研究北洋海军之始。其后继起者则以池仲祐为最著。池氏本海军中人，从青年时代即投身海军，于1880年冬以文案随丁汝昌赴英国接超勇、杨威两快船回国，著有《西行日记》两卷，记接船事甚详。1918年撰成《海军大事记》，严复称此书对海军“得失兴废粲然如视掌列眉”。曾自称：“申、午两役死绥将士，多与贱子雅有情愫，每值船泊，云天怅望，未尝不黯然神伤也；而且战尚存诸公，忠勇亦复可敬，是均不可以无传。”因又历时八载，始将《海军实记》杀青。此书为有关中国海军的第一部专史。近人吴廷燮评曰：“其文瞻，其事覆，不遗善，不隐恶，非古之所谓信史欤！若考据之详博，甄

搜之勤苦，记述之扼要，则又为近代官书所莫及，而治国闻者所必宜读也。”实为确评。今之治海军史者尚不能不读此书。

但是，对于北洋海军的正规研究，应该说是始于本世纪30年代。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近邻日本最是野心勃勃，大有一举灭亡中国之势。值此神州即将沉沦之际，我爱国学人以借鉴历史，警示国人，奋起救亡。30年代初，张荫麟正留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有机会读到北洋海军英籍洋员泰莱（William F. Tyler）于1929年在伦敦出版的在华回忆录《中国事记》（*Pullings in China*），甚感兴趣，因将其译成中文，改题为《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于1931年在《东方杂志》刊出。1933年回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进一步搜集有关资料，于1934年撰成《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一文，在《大公报》的《史地周刊》第一、二期连载。全文共分七节，其第三节《北洋海军之经营》，第四节《北洋海军发展之停顿》、第五节《西后与海军》、第六节《琅威理之就聘与去职》、第七节《甲午战前之大阅》，所论皆有关北洋海军创建与发展的重要问题。翌年，所作《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一文，在《清华学报》上发表，并出版了单行本。此文一出，影响巨大。直到今天，仍为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学者所重视，从中收到启迪之益。不过，此文的重要性，主要不在于其中的某些结论，而在于作者的科学研究态度和所使用的方法。作者指出，以往关于甲午中日海战的记载，“不独中日双方之报告互有出入，即我国之记录，亦多舛舛。除极抽象之轮廓外，旧史所承认之细节，由今观之，几于无一不成问题，乃知严格考信之需要与艰难，于近世史初非例外。”鉴于当时北洋海军研究的现状，作者认为微观研究不可忽视，主张将传统的考辨方法用于近代史研究，在求实上多下功夫，并亲自实践，作出了榜样。可惜他英年早逝，享年才37岁，不然在北洋海军研究方面必会有更大的成就。他原有写作《甲午战史》的计划，也终未能如愿以偿，使后之学者深以为憾。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时期,北洋海军研究蔚为风气。当时,《清华学报》、《海事》、《大公报》等报刊陆续刊载了一大批有关北洋海军的文章。这些文章多侧重于甲午海战研究受到学界的重视。兹以《海事》杂志所刊文章为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有关甲午海战之资料。如《汉纳根向北洋大臣报告公文》(1934年8卷5期)、《中日海战史料》(1935年9卷6、7、10期;1936年9卷12期)等。(二)有关甲午海战的概述。如《中日黄海海战纪略》(1934年8卷5期)、《中日威海战役纪略》(1937年9、10、11期)等。(三)有关甲午海战的述评。如美国海军战略理论家马汉(Alfred T. Mahan)的《黄海海战评论》(1935年9卷12期,原题 Lessons from the Yalu Fight)、原北洋海军镇远号帮办美籍洋员马吉芬(Philo Mc Giffin)的《黄海海战评述》(1936年10卷3期,原题 The Battle of Yalu)、归与译编的《中日海战评论提要》(1936年10卷1、2、3期)等。所有这些,既为研究者提供了许多难得的重要资料,弥补了文献记载之不足,又对甲午海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填补了以往研究中的某些薄弱环节。只是由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致使北洋海军研究迅猛发展的势头被迫中止下来。

进入50年代,我国历史研究的发展有了新的转机。但是,在一个时期内,一般对北洋海军的评价却是倾向于否定的,故研究者极少涉足这一课题。1957年,郭毅生教授在《文史哲》上发表了《论甲午黄海大战与中国北洋海军》一文,始打破了北洋海军研究的长期沉寂状态,可谓功莫大焉。不仅如此,郭文还是一篇非常好的争鸣文章。文中提出了三点:其一,“现在的近代史书籍中,甲午战争被描写得灰黯失色,毫无生气,似乎清政府不抵抗,连广大人民、士兵群众和爱国将领等也被腐蚀了。很显然这是违背历史的。”其二,“对于中国北洋海军,我们觉得有很多问题值得重新加以研究和估计。”其三,“海战开始前阵形排列也不是总兵刘步蟾为

了懦怯的目的而擅改，海战中广大将士都异常英勇，值得大书特书。”这些看法一反传统的观点，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遗憾的是，这场本应展开的有关北洋海军的讨论却未能进行下去。我在该文的启发下，曾专门写过一篇重新评价刘步蟾的文章，在当时也找不到发表的机会。处于无奈的情况，我在1959年所写的《中日甲午威海之战》中，便只好采取不显眼的方式，用“奋勇督战”四个字来表示对刘步蟾的评价（见1962年版第19页）。后来，由于“文革”发生，历史研究基本处于停顿的状态，更谈不上学术争鸣了。

但在此时，台湾的北洋海军研究则异军突起，为学界注目。其代表人物为台湾师范大学王家俭教授。他从研究中国近代海防思想入手，于1967年上半年发表长篇论文《清季的海防论》，继又在下半年出版专著《魏源年谱》，真是一鸣惊人！盖作者不满于国人忽视海军与海防研究的现状，深感“若无强大的海军，我国的海权与国防安全，殆即无从保障。而欲求将来在海洋发展史上争一席之地，更将困难重重。”遂毅然从事是项研究。其后，又在此基础上，开始转向专题研究，连续发表多篇有关论文，为北洋海军研究作出了贡献。

自拨乱反正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学术禁区，北洋海军研究开始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有关北洋海军的论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内容涉及北洋海军的性质、海军人物评价、历次海战与海防思想、洋员与北洋海军、海军建设与洋务运动等等，大大拓宽了研究的领域，在专题研究方面有不少突破。与此同时，有关海战与海军的专著也出版了多种，如孙克复、关捷著《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张玉田、陈崇桥等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张墨、程嘉禾著《中国近代海军史略》（海军出版社，1989）、吴杰章、苏小东、程志发主编《中国近代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胡立人、王振华主编《中国近代海史》（大连出版社，1990）、姜鸣著《龙旗飘扬的舰

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1)、《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三联书店, 1994)、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编著《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 1994)、鲍中行著《中国海防的反思——近代帝国主义从海上入侵史》(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8)、戚其章著《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1)、《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3)、《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 1990)、《晚清海军兴衰史》(人民出版社, 1998)等。至于已经出版有关会议的论文结集, 有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编《甲午海战与中国近代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和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与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办公室合编《甲午海战与中国海防》(解放军出版社, 1995)两种。这充分表明, 海军史研究已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 并将整个研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由上述可知, 北洋海军研究的发展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而是历经曲折, 才取得了如此可观的成绩。尽管如此, 我们却不可因此而满足。应当承认, 北洋海军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不仅在研究领域方面尚须进一步拓宽, 而用仍存在许多研究的薄弱环节和有待于去填充的空白。这就需要研究者继续做出更大的努力。近年来, 在威海举办了多次有关北洋海军与甲午海战的学术讨论会, 每次都有海内外学者踊跃参加, 或交流研究中的最新创获, 或根据新发现的资料修正成说, 或对某些流行观点展开争鸣, 气氛十分热烈, 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 有助于推动北洋海军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本《北洋海军研究》, 就是这几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选辑。全书共分“成军”、“抗敌”、“人物”、“启示”四篇, 基本上概括了以往几次有关北洋海军及甲午海战问题讨论的主要内容。

在中国近代, 创建北洋海军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艰难缔造的北洋海军, 其实力一度在远东居于首位, 使各国皆刮目相看。但

是，其兴也缓而衰也忽，其成也难而败也易。本来，在甲午战前的30年中，中国既有发展海军的机遇，也面临着来自国外的挑战。当时顺应历史的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发展海军的机遇，因此收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主要的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的当权者稍有所成便心满意足，对外来的挑战并未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更未能落实有力措施以迎接外来的挑战，以致错过了这百年难逢的历史机遇。聚九州之铁铸此大错，追悔何及？北洋海军的兴衰虽已成为历史陈迹，然仍值得今人认真反思，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正由于此，出版《北洋海军研究》一书，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相信读者阅后是会受到教益的。所以，我愿意向读者介绍此书，并希望以此书的出版为开端，这一工作还能够接续地做下去。

1999年9月于山东社会科学院

北洋海军研究

序 戚其章

成军篇

-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海军 戚其章 (3)
- 丁日昌与北洋海军的筹建 赵春晨 (18)
- 甲午战争前的北洋海军 胡 滨 (30)
- 甲午战争和中国海军的近代化 史滇生 (48)
- 国际科技转移与北洋海防建设 王家俭 (62)
- 论洋员在洋务运动中的角色与作用
- 《北洋海军章程》及其军事学术价值 张一文 (84)

抗敌篇

- 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 中塚明 (95)
- 关于日本海军的《廿七八年海战秘史》 中塚明 (104)
- 论北洋海军将领的爱国精神 宣兆琦 张 杰 (111)
- 从近代海军作战的阵法 and 战法评中日甲午
黄前海战 许 华 (122)
- 北洋海军与黄前海战后期战场 孙克复 (138)
- 北洋海军将士的民族精神 关捷 杨惠萍 (151)
- 晚清海战理论及其对甲午海战的影响 皮明勇 (161)
- 重评清廷在甲午战争中的“海守陆攻”战略 刘 庆 (175)
- 后勤保障不力，壮士徒唤奈何——谈北洋海军后勤保障存在的
几个问题 丛领兹 龙进峰 (191)
- 论北洋海防的电报通讯 王记华 (205)

人物篇

- 略论邓世昌的爱国主义 戚其章 (223)
- 论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 戚俊杰 (229)

研究北洋海军及丁汝昌的重要历史文献	威海莹 (249)
——读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	
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考	苏小东 (259)
关于李鸿章在创建北洋海军中若干 问题的评议	商鸣臣 (275)
论李鸿章的海防思想	威海莹 (291)
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刍议	张 炜 (305)
李鸿章与北洋舰队的覆灭	王楚良 (318)
论方伯谦被杀是否冤案问题	戚其章 (332)
也谈方伯谦被杀的问题	胡小园 (335)
论甲午黄海海战方伯谦先逃问题	孙克复 (360)
关于近年来方伯谦评价的一些情况	姜 鸣 (374)
论方伯谦问题	刘申宁 (388)
北洋海军管带(舰长)群体与甲午海战	苏小东 (416)
琅威理与北洋海军	戚其章 毕华健 (438)

启示篇

晚清海军兴衰的历史启示	戚其章 (459)
甲午海战挫败的几点反思	王家俭 (476)
甲午之败，发人深省	戚俊杰 刘峪铭 (491)
海权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	许 华 (496)
北洋海军与民族精神	肖淑丽 刘峪铭 (508)
甲午战争百年文化沉思	郭沫兰 马洪希 (525)
甲午战争的历史思考	乔还田 (539)
甲午战后的海军重建(1895—1911)	张玉法 (547)
遥想甲午	张国红 (566)
后记	

成 军 篇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海军

戚其章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持续了大约30年之久，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洋务运动有两个口号：一曰“自强”；一曰“求富”。在“自强”的口号下，兴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并创建了近代海军。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成果之一。目前史学界正围绕着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研究一下洋务运动时期所创办的近代海军，可能会有助于讨论的进一步开展。

（一）中国创建近代海军的社会背景

清朝原先只有旧式水师，没有近代化的新式海军。海军的兴建，是由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而引起的。

早在19世纪30年代末期，我国便开始了最早的买船活动。1839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到广州查禁鸦片。为了加强海上的防御，以防范英国侵略者的武装挑衅，他曾从美商手里买进一艘1080吨的商船，改为兵船使用。这是中国购买西方船只的开端。与此同时，林则徐还捐资仿造西船。到1840年4月，即建成了两三艘。这又开我国建造西式船只的先例。当时买船和造船的目的，都是为了防范西方的侵略。

到50年代，由于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清朝统治集团为挽救分崩离析的局面，一面调兵遣将对太平军进行围剿，一面则购买西方船只配合进攻。由上海江海关税务司英人李泰国经手，曾先后买进铁皮轮船和炮舰各一艘。清政府起初还没有

自办海军的意思，主要是雇佣西方轮船，对太平军进行“水面攻剿”。但是，这些雇佣的外国船只听命于其本国政府，甚至有时“大为掣肘”，使清朝当局十分恼火。恭亲王奕訢说：“借兵剿贼，流弊甚多，若只购买外洋船炮，尚属事权在我。”^①于是想自办海军了。

自办海军需要火轮船，是设厂自造，还是向外国购买？总理衙门的满族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认为，军情孔亟，自己设厂造船“非年余不成”，缓不济急，不如直接从外国买船，“剿办更为得力”^②。曾国藩也认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③于是，清政府便决定“购买外国船炮，以资攻剿”^④。时值已升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李泰国休假回国，总理衙门就委托他在英国承办购船事宜。1863年，共用银107万两，购妥中号兵船3艘和小号兵船4艘。清政府拟派巡抚营总兵蔡国祥统领这支舰队。不想李泰国竟擅自任命英国军官阿思本为舰队司令，并私立合同13条，规定舰上军官、炮手、水手的选用概由李泰国、阿思本决定；他们只对清朝皇帝负责，皇帝的谕旨还须经李泰国转达，“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⑤。这实际上是妄图把这支舰队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此事揭出后，顿时朝野大哗。总理衙门也认为：“所立合同13条，事事欲由阿思本专主，不肯听命于中国，尤为不谙体制，难以照办。”^⑥于是令将舰队驶回英国变卖。因李泰国“办事刁诈，以致虚糜巨款”^⑦，被革去总税务司职务。清政府出于镇压太平军的目的，初次试办海军，就这样落了空。

买船办海军的计划失败后，清政府便开始转向设厂造船来筹建海军了。1866年2月，太平军失败。6月，左宗棠向清政府建议设立福州船政局，开厂造船。他的建议是从加强海防以防范外国侵略的角度来考虑的，如说：“各国向以船炮称雄”，“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⑧福州将军庆春也说：“闽厂制造兵轮船，原为捍卫海疆起见。”^⑨福州船政局

的设立，便为中国建立近代海军初步奠定了基础，故有人称之“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⑩。由此也可看出，此次设厂造船办海军的宗旨，与三年前买船办海军以镇压太平军为目的，是完全不同的。

清政府设厂造船办海军，本是为了防范外国的侵略，但自从设厂以来，到1874年为止，才只造了19艘船。另外，从国外又买进了10艘。这些船，由于吨位很小，装备陈旧，加之分散各处，缺乏统一的指挥，只能用于沿海巡缉，根本无法抵御外国的海上侵略。是年5月，便发生了日本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的事件，日本政府竟然设置台湾事务局，任命长官，并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率侵略军3000人在台湾南部琅琦（今恒春）登陆。日本对台湾的侵略行动，刺激了清朝当局，开始觉察到日本势将“为中国永久大患”^⑪了。许多官员认为，日本之所以肆无忌惮地出兵侵略台湾，“正恃铁甲船为自雄之具”，“中国无此船为可虑之尤”^⑫。甚至提出“购买铁甲船以为自强根本”^⑬。福建巡抚丁日昌更指出：“现闻春夏间日本在英国新购铁甲船二号，均已制成下水。该岛距泰西远而距中国近，且亦断不敢与泰西为难。然则彼竭倾国之力而制此利器，其意果何为哉？”^⑭可见，当时清政府决定购买铁甲船，以加强海军的力量，确实是“隐为防御日本之计”^⑮。李鸿章说：“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⑯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许多有识之士也深感有组织海军舰队的必要。如说：“方今外洋环伺，迭起衅端”，“彼所以肆意要挟者，亦以我之海军未立也”^⑰；“挫外夷之凶焰而折其谋，而其端则必自海军始”^⑱。因此，可以说，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推动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和发展。

有些论者认为，洋务运动办海军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揆诸史实，这是没有根据的。本来，作为国家政权主要支柱的军队，有对内和对外双重职能。洋务运动期间所办的海军，自不例外。但是，